



WEIFANG XUESHU CONGSHU

宁稼雨著

魏晋风度

宁稼雨著

魏晋风度

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

东方出版社

魏晋风度

WEI JIN FENGDU

——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

著者/宁稼雨

封面设计/尹凤阁

责任编辑/刘丽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9.125 字数/215,000

版次/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 ; \$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42-6/G·34 定价 5.25元

序

宁稼雨是我结识的一位新朋友。使我们成为朋友的是这本《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以下简称《魏晋风度》)。

我曾读过此书的初稿，以为出自一位前辈之手，便修书一封，毕恭毕敬，称之为先生。及至与之晤面，始知是同辈。交谈起来，竟均觉同感良多。他便嘱我为之作序。

我们的同感良多，当指在理解有关人的诸问题上的契合：人的存在，人的追求，人的幻想，人的无奈，人的荒谬；人的真实与虚伪，高尚与卑微；丰富与偏狭，超然与世俗；人生，人性，人情，人格……这总使我感到海德格尔有句话的意味深长：“任何时代也不比今天对人是什么知道得更少，也没有任何时代象我们今天这样对人有如此多的疑问。”应该说，这种弥漫于现代人脑际中的疑问也同样纠缠着我们这一代人，它也未尝不是宁稼雨述而作之以反观古人，明鉴来者的初衷。当然，不能否认，“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歌德语)。但是，如果在这番重新思考中可以见出作者对人生的另一

层“我的”体味，那么，人的这种追根究源，欲穷终极的形而上学本性则或许不见得那么迂腐。

魏晋风度是个颇具魅力的话题。

历史告诉我们，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时代。其时，玄风大畅，道体自然。人们通过哲学、文学、绘画、音乐乃至书法抒发自己对宇宙、对人生的感悟与领会。他们从来没有把人的生活仅仅作为人的自然的或世俗的日常活动，而是使生活本身成为诗意的存在，把个体的行为独立为精神的、审美的对象，咀嚼再三，加以品味。因而，魏晋风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魏晋文人有一种放诞不羁、潇洒飘逸、旷达超远、啸傲人生的气质（这种气质使我们后人为之倾倒），更因为在这种特立独行的举止、性情的背后，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或存在的真实（这种真实的存在或存在的真实亦为我们后人所希冀）。

在这种存在之中，扮演主角的依然是人。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体现者、承启者。在世世代代的文化的创造、体现、承启的流动中，一些文化使人更完善，一些文化使人异化为非人。人在各种文化的张力作用下，总是处于选择之中。魏晋文人的行为选择，直接地看，来自于他们的气质、性情（其实气质、性情也有文化的内涵），更深层地看，则有其时代的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人生态度的基础和意向。当然，我们在魏晋人的行为中还看到一种双重性：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心神不安和浪漫精神，渴望无限，渴望永恒，另一方面又显现出非常坚定地安于其存在；一方面他们真实地表现个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拼命地矫饰自我；一方面超然物外、遗世独立，另一方面又固于世俗，自闭尘网；一方面是注重个体生活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摆脱不掉个体生活的无效性。这种双重性，固然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冲突，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人类总体的永恒的矛盾呢？问题

在于，每一个时代，都是一种主导文化在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生活。那么，魏晋人行为的文化意蕴在书中被概括为哲学思想上的崇无轻有，社会思想上的重个体轻社会，政治思想上的重道统（文人的良知）轻势统（封建统治），人生态度上的重审美轻实用确实切中肯綮。

历来的思想家们都认为自己发现了真实的存在，实际上，他们都不过是从某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全部世界的一个点。不知《魏晋风度》是不是也有意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点。如果说，以一种理论框架为基准，俯瞰某一时代人们的生活、行为现象，以它们来证实这一理论框架的研究方法是焦点透视的话，那么，象本书这样，展示某一时代人们的生活、行为，勾勒其风貌，并逐一挖掘其文化的内涵，进而建构其理论框架的研究方法，则是一种散点透视。两种方法不能说孰优孰劣，然而这种视角的转换，将其“以形写神”作为出发点，追求“形神兼备”的境界，不能不说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点，至少是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现代人自身的一个点。

因为，历史是一条长河，她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是她自身的延续，还是对她的认识，都无法割裂，更不会停止。

只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因 之

1991年3月31日于北京

引　　言

笔者在本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描述一幅活的魏晋文化风貌图。

活，就是要生动、形象，这与研究的角度和重心有关，也与人们认识魏晋文化的途径有关。一般来说，人们认识魏晋人生活言行的风采，要经过各种理论框架的中介。在各种魏晋文化的断面研究（如哲学、历史、文学、宗教、风俗、社会等）中，都或多或少地附以魏晋文人的生活言行，用以说明理论的框架。这对于理论的框架和义理研究都是必需的，因为这种研究的主体是理论，而不是生活言行。然而由于这种研究的惯力作用，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生活言行只能作为研究的附庸，只能用来为说明主体服务，这就不大公平。主角和配角不过是人们价值观念上的一种习惯，随着观念的更新和变化，它完全可以改变或倒置。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这里准备给魏晋文人的生活言行以主角的地位，让这些丰富多采，妙趣横生的音容笑貌成为研究的对象和主体。让那些往日的主角——各种理论框架成为配角，成为各种魏晋士人言行的注解和诠释。这也许对往日的主角有些不敬，但倘若它能给文化研究带来一些新机的

活，那么它的过失庶可由其贡献所补偿。

活，又不能漫无边际，象水出四溢那样毫无章法。既然是文化研究，就要对这些丰富多采的生活行为进行深入的理解、咀嚼和剖析，找到它与时代文化的从属关系，否则，这些生活行为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成为空中楼阁，人们只能看见它的轮廓，而不清楚它何以成为这种轮廓。如同不懂剧情、背景、唱腔便去听戏，除了服装、脸谱可以留下点儿视觉形象，吱吱嘎嘎的琴声和唱腔可留下点儿听觉印象外，别无所获。理解了文化背景，才能看懂这些生活行为的真正内涵，才会对它发出会心的微笑。如果说，把活的生活行为确立为研究的主体，需要勇气和敏锐的话，那末这种文化的追踪则需要功力和耐心。

描述就是尽量客观地介绍情况，梳理出各种生活行为与文化背景间的内在联系，尽量少发空洞的议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评价的需要。千百年来，魏晋文人的生活行为总是受到很多人的指责，所谓“清谈误国”是也。尽管也有个别肯定他们的人，但比起否定意见，就如同沧海一粟，对比过于悬殊。现代史上以鲁迅和宗白华的肯定意见较有代表性，也能切中肯綮地指出这些生活行为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①。笔者基本上赞同他们的意见，但又觉得他们的见解虽然正确，但材料和论据却还显得不那么充分，所以容易作为缺乏说服力的偏见而受到别人指责^②。这里采用描述的方法，就是要避免这一缺憾，让事实本身来说话。褒贬虽有，却尽量寓于事实之中，在描述中表达笔者的个人看法。由于客观，所以对魏晋文人生活行为的认识并非铁板一块，绝对褒贬。如对正始文人与元康以后文人生活行为内在意义的看法，在褒贬的分寸上是不尽相同的。

① 参看本书第四章关于魏晋玄学历史评价的有关内容。

② 参看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册关于玄学的历史评价。

图，就是横断切面，取其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生活现象，进行文化分析，以使重点突出，这是与史相对而言的。史这种东西很不好写，既要面面俱到，又要有关真知灼见。可是在好多史中，“真知灼见”常常被“面面俱到”所淹没。见到同行的这种悲剧，故而不敢重蹈其辙。虽是企图另辟蹊径，亦属藏拙之举。好在图是形象可感的，它由若干还算生动的故事组成。即使对文化不感兴趣或理解不了，把其中的生活行为当作故事来读，也未尝不可。也许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吧，或云“雅俗共赏”可也。

提出任务不等于完成任务。本书的任务完成得如何，将由专家和读者来评价，余恭而待之。

作 者

1991年3月于南开大学

目 录

序	因 之 1
引 言	1
一、魏晋世家大族的优越感	1
(一)门第的形成与大族的表现	3
(二)从行为表现看门第的历史贡献	13
(三)门第观念与世族行为	21
二、士人言行与南北文化异同	28
(一)南北政治对立情绪	28
(二)南北学术风气异同	42
(三)南北语言流变	52
(四)其它方面	57
三、士人言行与人物品藻	61
(一)汉魏以前的人物品藻	61
(二)东汉士人在人物品藻中的表现	65
(三)魏晋士人在人物品藻中的表现	72
四、士人言行与魏晋玄学	86
(一)玄学的产生及其历史评价	86

(二) 历历在目的思辨精神	91
(三) 从士人言行看若干玄学基本问题	100
五、士人言行与魏晋佛学	116
(一) 魏晋佛学的背景与概况	117
(二) 从士人言行看魏晋佛教的基本情况	122
(三) 从士人言行看佛学与玄学的合流	136
六、从生活行为看魏晋文人个性	151
(一) 形成魏晋文人个性的主客观条件	152
(二) 士人言行与自我意识	161
(三) 魏晋文人的个性活动	165
(四) 魏晋文人的个性交往	178
七、士人言行与魏晋文学艺术	185
(一) 从士人言行看魏晋文学艺术思想	186
(二) 从士人言行看魏晋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	202
(三) 士人言行与文人集会活动	220
八、从士人言行看其审美人生态度	227
(一) 中外贤哲对人生审美问题的认识	227
(二) 魏晋人审美人生态度的思想渊源与精神实质	230
(三) 审美人生态度的表现	234
九、士人言行与魏晋风俗	243
(一) 服药	244
(二) 饮酒	254
(三) 服饰	264
(四) 博戏	273

一、魏晋世家大族的优越感

公元四世纪中叶，东晋王朝征西大将军桓温和部下长史王坦之之间，演出了一场为双方子女安排婚姻的戏剧性故事：桓温请求王坦之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王坦之回家问问父亲王述（蓝田）。回到家中，王述先是喜欢地把王坦之抱在膝上，可当他听完儿子所述桓温求婚的意思后，立刻勃然大怒，把儿子摔到地上，说：“你简直是个傻瓜！你是害怕上司吗？怎么能把女儿嫁给当兵的人家！”王坦之无奈，只得向桓温撒谎说女儿已经订婚。桓温立刻点破他说：“我知道，这是你父亲不允许。”而后来王坦之的儿子却娶了桓温的女儿^①。

故事中有两个问题恐怕令今人费解：其一，一个下级官员为什么不肯与上司联姻，而上司遭到拒绝后为何无能为力？其二，为什么王坦之的女儿不能嫁给桓温的儿子，而儿子却可以娶桓温的女儿呢？

问题的关键即在于门第的优劣及其观念使然。

门第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当时封

^① 见《世说新语·方正》。

建社会主要的政治经济形式，并深深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而且对当时的文化人员队伍构成和文化内容的渗透，也都有较大的影响。从门第及其优越感来认识魏晋风度，是把握中古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①。

什么叫门第？在相当长时期内，人们往往只从阶级性上对它限定，而忽略了门第的其他社会因素，因而也就免不了庸俗社会学的樊篱和偏见。这里我们所说的门第，实际上就是“家族”在中古所发展形成的特殊形态^②。

关于门第的称呼，史书中极不一致，从家门贵盛方面看，有人称之为高门、高户、门第、门地、门望；从身份的华贵方面看，有人称之为膏腴、膏粱、甲族、华侨、贵游；从权势方面看，有人称之为势族、族家、贵势；从家族延绵方面看，有人称之为世家、世胄、门胄、金张世族、世族；从姓氏观点看，有人称之为著姓、古姓；从家门社会地位方面看，有人称之为门阀、阀阅；从家族名声方面看，有人称之为名族、高族、高门大族；若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看，有人称之为士流、士族。这二十七个称呼，所指角度各有不同，意义也有细微的区别，但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的^③。

家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来已久，家族的社会地位有高下贵贱之分，亦普遍存在。而“门第”这种家族，除了有高下不同的社会地位外，更有些不见于其他古今中外家族的性质和对社会文化心理所产生的氛围熏染和渗透作用。这种特殊的门第形式，通

① 门第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除了其自身的研究价值外，也是因为研究中古时期任何问题，均必须与此发生联系。不了解门第，就不会真正认识中古文化。参见何启民《中古门第之本质》，载《中古门第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版。

② 参见何启民《中古门第之本质》。

③ 参见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上册，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

过正史与野史，以至小说的相互参证，更可以得到立体的说明。

（一）门第的形成与大族的表现

关于门第形成的时间，史学界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它萌芽于西汉末年，东汉中叶以后渐次出现，魏晋时期便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而受到法律的保护^①。

门第最开始是随着部分家族经济实力的扩大而萌芽，而当它的政治地位受到保护后，便是它形成的标志与界限。西汉末年，已经出现了部分较大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这样的图景，在东汉末年博陵崔寔所著《四民月令》中，有比较全面的叙述。在其他史籍中，也有不少说明，如《后汉书·樊宏传》记湖阳（今河南唐河县南湖阳镇）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其营理产物，物无所弃，课役僮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广开田土三百余顷”，而且他还“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巨万^②。”马援则在“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③。”及其屯田天水苑川，“请与田户中分^④。”

到了东汉末年，门第的经济力量继续得到发展。如开封郑太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有时竟不能足供食用。当董卓迁都长安时，天下饥乱不堪，士大夫多有饥贫至死者。而郑太家却尚有余资，不但日聚宾客多人高会倡乐，而且还救济难民日多^⑤。同时，

① 参见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水经注·比水注》。

③ 《后汉书·马援传》。

④ 《水经注·河水注》。

⑤ 见《后汉书·郑太传》。

门第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开始得到承认。从前，“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畝，不系阀阅”^①，现在却“选士而论族姓阀阅”^②，“贡荐则必阀阅为前”^③，“以族举德，以位为贤”^④。这种政治特权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便是累世公卿的局面。如东汉弘农杨氏，自震至彪，凡四世皆为三公。汝南袁氏，自安至隗，则四世五公。到了曹魏时期，由于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州郡大小中正皆由望族担任，所以九品的评定，成为门第间权利分配的合法程序和门阀作为一种制度的法律保证。“世资”成为官品升降的凭藉，以至于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⑤，“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⑦的局面。例如：颍川荀氏，自荀淑仕汉为朗阴令，淑子爽官至司空，淑孙彧为曹操谋臣，位至尚书令，荀氏在魏晋南北朝，世为“冠冕”。颍川陈氏，自陈寔仕汉为太丘长，寔子纪位至九卿，纪子群仕魏至司空，其后子孙历两晋南北朝，皆处高位。此外，如平原华氏、东海王氏、高平郗氏、河东裴氏、河东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北地傅氏等，其子孙直至魏晋南北朝，还是“衣冠”联绵不绝。另如东晋南朝时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北朝时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也都累世富贵^⑧。尽管从九品中正制实行以来，尤其是西晋时刘毅等人对门阀制度提出很多严厉的抨击^⑨，但由于他们抨击的并不

① 《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

② 仲长统《昌言》。

③ 王符《潜夫论·交际篇》。

④ 《潜夫论·论荣篇》。

⑤ 《晋书·王沈传》。

⑥ 《廿二史札记》。

⑦ 《晋书·刘毅传》。

⑧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 参见《晋书·刘毅、段灼、刘惔、王沈四人本传》。